

莫斯科的各种活动集团

〔美〕艾薩克·多伊彻

(原載美国《民族》周刊 1965 年 4 月 5 日)

赫魯曉夫下台后的苏联政权現在已經存在五个月了。它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領導人的謙虛和沉默寡言。看来好象他們已經發过这样的誓言，即他們中間誰都不為自己謀求聲望，因而誰也不能使自己处于主席团的同事們之上和建立个人优势。继赫魯曉夫口若悬河的夸夸其談之后，沉默再一次被认为是可貴的，只是在政治上有絕對必要时，一个領導人才有权把它变为公开演說这种次一級的东西。因此，要在亚洲发生风暴时，才让柯西金总理在他的远东之行中发表他的第一次重要政治演說（在国内，他迄今只是在去年十二月的最高苏維埃會議上公开讲过一次話；但当时他是以主要的經濟計劃人而不是以总理的身份发表講話的；而且他对最高苏維埃做的是一个几乎毫无政治內容的关于苏联經濟情况的年度例行报告）。党的新任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一直还没有开过口。他甚至絲毫也沒有作过关于他和他的前任之間的政策分歧（如果有分歧的話）的公开解釋。在这种神秘气氛中，不只含有一星星的斯大林主义。

在这样一层厚厚的謹慎从事的帷幕后面，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赫魯曉夫的繼承者还在繼續估量他們所接受的遺產，試圖查出其中有多少是他們可以保存的，有多少是他們必須拋棄的。他們也正在重新安排、重新分配和检查政权的各种杠杆和工具。把党和国家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分开来，这是自斯大林死后所作的第二次努力；前一次努力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当

时馬林科夫任总理而赫魯曉夫当上了第一书记。苏联許多公民希望从权力的相对重叠中产生很多好处；有些人认为它是公民自由真正发展的先决条件。这种想法是有悠久的历史，在斯大林独裁的初期，“右翼反对派”的大理論家布哈林就得出結論說：“我們的政治制度的万恶之源就是党和政府全盘融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将近四十年以后，人們現在完全独立地得出了同样的結論，并且正在努力解决这个“万恶之源”。然而，在解除党和政府的特权的时候，对这两个权力机构中的每一个机构又都加以改組和重新合并，以克服赫魯曉夫的一些分散安排所引起的后果。

真正的权力繼續属于党。第一书记仍然比总理重要得多。然而，他的同事們是这样害怕和妒忌他所拥有的权力，以致他們一直不让勃列日涅夫先生在他的平等者之中居于前列。主席团的确已經暫時取消了一切先后次序，因而沒有一个成員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柯西金先生由于在河內、北京和平壤露面和談話所取得的一点点突出地位，也許在莫斯科是不受欢迎的。为了抵銷这种影响，勃列日涅夫先生很可能要出面，引人注意。

因此，情况很清楚，“集体領導”，即把权力分散給赫魯曉夫的各个繼承者，現在的确是十分真实的。主席团做出所有关于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决定。它經常开会，一个礼拜要开一次或两次。遇有緊急事件或国际危机时，它可以立刻召集起来。只要不由于

內部尖銳分歧而分裂，它是能够迅速而坚决地行动的。在发生这种分歧的情形下，臃肿的中央委员会就负起它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任务，作出决定的程序就变得复杂而缓慢了。

我不打算纵谈克里姆林问题专家们爱耍的那套把戏，即讨论人物的性格和猜测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或沃罗诺夫的机会，以及他们各人对勃列日涅夫或柯西金的态度。这些由克里姆林宫明星组成的特权阶级是非常反复无常和难以捉摸的。而且，这样做大体上也是不相干的，因为最近认为赫鲁晓夫是动不了的独裁者和弗·罗·科兹洛夫是他的推定继承者的人，现在应当已经吸取了教训。远为稳定、重要和明显的，是主席团的人所依靠的基本阵容，因为主席团或中央委员会都不是在真空中活动的。

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及其周围存在着一些有势力的活动集团和压力集团。它们代表着众多的冲突和共同行动经常互起作用的派系利益。最有势力的活动集团的发言人可以同主席团直接通气。他们往往参加主席团的会议，如果不是作为与冲突有关的方面，就是作为专家和顾问。

以下是大致根据它们的重要性而试列的这些活动集团和压力集团的名单。

(1) 核科学家、核工厂的经理、核部队的首脑和负责外层空间试验的人。同别的习惯压力集团比起来，他们是一个小而不断扩大的集团；比其他集团年轻得多，但组织更严密，并且具有非凡的自信心。作为一个集团，他们掌握着国民净收入约百分之十到十五，即每年提供科学研究、核军备和外层空间航行之用的一百七十亿到二百五十亿卢布。这一集团的成员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极其现代的科学观结合起来的，他们知道他们对党和国家是如何不可少的，并且完全不怕党的头头。（举例来说，核

科学家是艺术“先锋”的主要赞助人，他们庇护非正统派诗人；他们购买抽象派绘画和雕刻；并且以这种方法使“现代派”艺术家能够顶住伊利切夫和其他艺术检查者的愤怒——这在莫斯科是一个公开秘密。）

(2) 重工业和工程的主要计划人员和经理人员仍然代表着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经济势力。但是，这个活动集团的力量已经由于莫斯科中央人物和各共和国与省的经理集团之间的对抗而削弱了。在1957—1958年，在中央的计划人员遭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当时赫鲁晓夫解散了全联盟的各工业部；现在力量对比似乎正在重新变为对他们有利。这个活动集团的人通过中央计划委员会、各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并且直接通过中央委员会而发生作用。

(3) 工会活动集团，组织为全苏工会理事会，对于有关社会政策和国家工资结构问题的经济计划有重要发言权。工会的头头虽然代表着作为雇主的国家与工人相对的利益，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表达他们的广大会员的愿望，他们的会员包括大约七千万工人和职员。过去十年中，缩小工资和薪金之间的广阔差距和缩短工业中的工作时间，都是这个集团努力的结果。

(4) 城市活动集团一部分和工会活动集团重叠。城市活动集团的重要性是下述事实所引起的：仅仅从十二年前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城市人口约增加了五千万人，同英国或法国或意大利的全部人口一样多。对住宅的需要增长不可比拟地快于提供的住宅面积的增长，城市和工会必须加紧向统治集团提出居住处所的要求，尤其是在建筑落后于计划的近几年。

(5) 农业的利益：一方面由组织得很好并且很有势力的国营农场的主持人代表，另一方面则由集体农庄的胆小而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发言人代表。自从赫鲁晓夫决定耕种广

大的处女地以来，国营农业有很大的进展——这些处女地上的新农场都是国有的。但是，由于这一试验部分失败，集体农庄集团的势力有所增加；自从赫鲁晓夫走后，又得到进一步加强。

(6) 不很清楚的是，在这个名单上，常规军事部队的军官团确切地应当放在什么地方。在斯大林死后的时期内，它的势力波动很大。它有两次达到顶峰，即1953年夏天贝利亚垮台的时候和1957年夏天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降职的时候。在那时，苏联拿破仑出现的魔影悬在俄国舞台的上空；它在1957年秋天随着朱可夫元帅的失势而消失了。最近它的势力又有增加的迹象，可能是因为常规部队正在部分地恢复它过去的战略重要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核部队继续占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但现已年迈的元帅走掉），这个活动集团大概不会重新获得它在1953年到1957年之间所拥有的力量。

(7) 许多学术机关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伙伴所以有势力，大部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工作对国家经济问题的关系。这个活动集团和核科学家及高级经理人员结合，正在极力要求加速自动化发展的速度，计划技术的现代化，广泛和有系统地使用计算机。

(8) 新闻活动集团和文学活动集团对宣传是重要的，因而党的领导人和掌握党的机器的人员对这些集团的压力很敏感。但是他们对青年作家中持异见的人越来越多地感到害怕。这种异见的力量最近在莫斯科的作家联盟中表现出来，那时在一次选举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拒绝选举官方的候选人，把“异端分子”选进了这个联盟的委员会。

对这些活动集团作任何分类和说明，必然都是示意性的；它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出在一个将近有两亿三千万公民的准社会主义国家中起作用的压力和反压力的无限现实。在

本文所述的势力界线之上，还横贯着地理区域和民族的区分——其中有大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哈萨克、乌兹别克等等。这一切产生了从内部和外部对党和国家起作用的无限复杂性和种种不同的利益与愿望，而且，活动集团和压力集团本身还遭受来自社会深处、来自工农群众的压力和反压力的影响。

赫鲁晓夫的被推翻是在他执政的末年活动集团和压力集团对他所形成的异常广泛的阵线所促成的。两大危急发展促成了这种局势：农业的灾难性状态和因而引起的食物缺乏；以及由于中苏不和所引起的苏联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锐减。另一个因素是工人阶级的普遍的、爆炸性的不满，这主要是赫鲁晓夫在四、五年中默默地对工业规定的工资冻结所造成的。最近来自苏联的消息说明了这一因素的全部影响。按照苏联某些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可以说是接近托洛茨基派的——的说法，在赫鲁晓夫垮台之前，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厂全体工人举行了罢工，在整个顿涅茨克产煤盆地也发生了许多骚动不安的罢工。在顿涅茨克盆地，据说派出了军队，接着发生了流血冲突。罢工工人有二百人死伤。我不能担保关于顿涅茨克事件的报道是否正确，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关于莫斯科的罢工的消息。这些罢工似乎是经济性的，没有政治成份在内。但是它们促使工会活动集团变成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帮助把他推翻。

虽然苏联报纸丝毫没有向它的读者透露这些事件，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不得不在开始任职时就悄悄地取消了他冻结工资的規定，并且答应立即大大地扩充住宅建筑计划。

这些是形成苏联政策的真正问题和压力。它们要比大多数西方苏联问题专家所迷恋的党的最高阶层中任何个人对立更大和更加生动。这些根本问题甚至决定个人对立的結果；这些问题决定活动集团和压力集团在

中央委员会这一级上如何运用它们的势力，朝什么方向和为了谁而运用。这个事实说明赫鲁晓夫的继任者行为谨慎和沉默的原因，局势过于紧张和严重，以致他们不能冒老老实实在地讲话的危险。各集团的力量现在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它们可能怎样受到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的反抗情绪的影响，这是无法可说的。

而且，在所有种种国际警报声中和国内困难之中，有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即将到来，应该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在大会举行以前，一定要来一次公开

辩论的幻影；这种辩论甚至可能变成真实的。在党代表大会上，预计领导人将报告1961年以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谈一谈赫鲁晓夫危机，明确他们自己的态度和政策，并且努力取得他们这种迫切需要和仍然这样明显地缺乏的威信和公众信任。当然，这次大会可能推迟到规定的日期之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只会承认他们碍于工作要推迟大会。这种承认会削弱党的最高阶层缺乏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权威，并且使得已经成为国家危机的信任问题更加严重。

(莫斯科 小林校)

1965年会蹈1931年的覆辙吗？

〔美〕罗伯特·特里芬

(原载美国《记者》杂志 1965年4月8日)

约翰逊总统，在其二月十日给国会的关于国际收支和我们黄金地位的咨文中，实际上同意戴高乐总统所说的话：即二十年代的“把我们所有的人带进了三十年代初期的灾难。”不幸，一致之处就到此为止。

戴高乐总统相信，那时使我们失望的制度是所谓“金汇兑”本位制或“关键货币”本位制，这种制度同现在的制度很相像。只是坐在这个关键货币制度旧马车的赶车人座位上的，是美元而不是英镑罢了。他担心这个新制度会把我們引导到同样的崩溃，希望在不晚的时候对它进行剧烈的手术。

约翰逊先生和美国财政部并没有这样的担心。在他们看来，在1931年失败的不是金汇兑本位制而是金本位制，他们以为金本位制正是戴高乐希望恢复的东西。约翰逊总统说，相反地，我们应当“在我们现在所有

的制度之上搭建，或是一个新制度，或是一个为世界服务的新制度。”

虽然我不相信戴高乐总统的预言，但我相信智慧，事实会证明他的预言是错误的。崩溃所作的解释，那崩溃的不是1931年以前时期的纯粹的金本位制，而是戴高乐所认为明天注定要遭到同样命运的金汇兑本位制。在二十年代末期，美元存额数量，主要是英镑存额数量占英国和美国以外国家的货币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引起1931年世界货币制度崩溃的，是英国不能把外国中央银行，特别是法兰西银行积累的大量英镑存额兑换为黄金或美元。今天，英镑储备数量，主要是美元储备数量占其他国家货币储备的五分之二以上，而在最近七年中，占其他国家货币储备增长额的四分之三以上。没有疑问，各